

書齋裏的精神世界：
略談晚明清初的書齋記

李向昇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 一、引言

清初文人姜宸英有一篇〈停舟書屋記〉，寫自己在京城租了一間屋子，以舟命名，其文云：

予於京師宣武門外，從逆旅主人僦屋數椽，其半橢而分為室者三，畧如舟然，而以余之所居也，因名之曰停舟書屋。¹

屋子看來條件一般，是從一個房子裏分出來的三室，性質上或可比現在所謂的「劓房」。屋子狹長，就像船，因此命名「停舟書屋」。不想此名招來業主批評，直斥不吉利：

主人曰：「吾視往來之人，凡有事於江湖者，遠或數千里，近或數舍，莫不候風色、伺便利，計日併程，窮力而求至。故遇便風揚颿，聯艦比艘，乘濤上下。舟子安坐而擁櫂，行者憑艫而眺望。瞬息抵岸，則釃酒擊牲以為樂，此亦行旅之至適也。有舟於此，偃桅踣檣，蕩漾洲渚，曠日而不得濟，目送去者羣百千輩，己獨惶惑不離其處。此則勢之所去，而行道者之所不顧也。子之以是名也，必更之，無以子累吾居。」²

別人或有事於江湖，或行旅為樂，聯艦比艘，乘濤上下，往來不

停。但「停舟」，看着人來人往，自己卻惶惑不離其處，不知所往，停而不行，成了行道者所不顧，沒有用處的舟了。繁忙的京城，人人奔波不停，力求上進，姜宸英倒好，來個「停舟」，莫非要「躺平」？姜宸英反駁他說：

予曰：「子不知天道乎？夫盈乎彼，必虧乎此者，天之數也。子桑曰：『父母豈欲我貧，天地豈私貧我哉？吾求其為此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今是舟之遇我於此，亦命也，子惡庸諱是哉？雖然吾未見彼之必得而此之必失也。今夫駕風而行，勢若激箭，不終日而舍者，舟之常也。一旦風水撓之，及涯而阻者有矣。不幸放乎中流，卒然而遇不測之險，顧視兩岸，茫無涯涘。當此之時，則停舟之不如，且夫豫憂其顛隤之及？不當止而中止者，過也。舍其安居無患，而歆羨於目前之快意者，惑也。吾知命焉而已。」³

果不其然，姜宸英確要躺平，竟搬出天道來，說什麼盈虧有數，貧賤有命，與其羨慕放舟江海，駕風快意而行者，誰知他們不會「卒然而遇不測之險」呢？倒不如停舟，安居無患，順天知命，安貧樂道。這番反駁，說得自己參透世情，一副高人模樣，彷彿很有智慧。不想反被業主恥笑：

主人莞爾笑曰：「子言固當。然使子之有求於此，則無以異事營營者也。子信無所求也，則何不舍子之舟以返子之家？

偃息乎庭闈，散步乎園廬，流覽乎詩書，頓撼之所不及，驚
威之所不加，不亦善乎？孰與夫棲棲以待是者哉？」⁴

道理說得是不錯，問題是你真是這樣的人，有這樣的追求嗎？如果真是這樣無所求，要躺平，不如回鄉去，在鄉下找個屋子，蒔花弄草，徜徉其間，吟詩作對，豈不悠哉？何必來京城停舟？捨舟歸鄉豈不更乾脆？姜宸英被說得一時語塞，只好請業主閉嘴：「子休矣！吾行謀之矣。」

一間停舟書屋，經由筆墨，寄寓了姜宸英的三種心態：放舟，相當於積極用世，力求聞達；停舟，即他描述的樂天知命，隨遇而安；捨舟，即回鄉歸隱。儘管呈現出來的是「停舟」，但他並非真是樂天安命，主人的回應正揭穿了他。所謂停舟，真正的意義其實是等待。「停」和「舟」有矛盾關係，舟的本質意味著動，所以主人會取笑他如果真是無所求，不如歸鄉，何必停舟？對於舟而言，停是為了下一次的動，等待時機而已，就如他所自言「不當止而中止者，過也」，停非目的，要看當不當。儘管姜宸英最後說「吾行謀之矣」，但仍是租了房子以停舟命名。他並未詳細描述這個書齋的環境，然而這半橢分室的狹窄空間彷彿正和他這種複雜微妙的尷尬心境相映襯。

※ 二、道德空間：書齋記文的寫作傳統

書齋對文人來說是一個特殊的空間，一方面這是文人讀聖賢書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起點，也是文人考取功名，聞達於世的起點。因此雖有一定的私密性，但又擔負着某種道德力量，有介入公共道德場域的可能。另一方面，文人對書齋空間也常有山林化的想像，或本就是模山範水的園林中的一部分，或將書齋山林化，承擔着異托邦的作用，以和現實世界對抗。為這一空間作記，賦予書齋精神意義，這類文獻往往能體現文人的內心世界，尤其是讀書、入仕、歸隱的看法。姜宸英〈停舟書屋記〉中的放舟、停舟、捨舟，正是藉由空間書寫表露出來的心跡。這種寫作在中國古代散文傳統裏自有脈絡。

書齋即現代所謂書房、文房，以讀書、寫作乃至藝術創作為主要功能的生活空間。除了常見的「齋」，依據空間大小的差異還有不同的名稱，例如軒、室、屋、庵、樓、閣等。根據現存文獻，古人為這一空間命名最早可追溯至漢代楊雄的草玄堂，也有稱玄齋的，但並沒有專門的書齋記文。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命名並非出自揚雄，而是後人根據揚雄居於四川，撰寫《太玄》而命名。確切的出處已不可考，然而至遲在唐代詩文中便有著錄。唐以前文人有意識地為書齋命名且作文為記，表明自己的讀書場所還很少。傳為唐張弘靖所作的〈蕭齋記〉或許是最早的一篇，「蕭齋」

一詞也成了後世書齋的代稱。文章記李約得飛白「蕭」字的經過，再寫此字風采及李約為人，最後點出「蕭」字切然而清，蔚然而整的意涵，正是傳統記體文的寫法，記敘經過，點出緣由，不重議論，還未形成書齋記文的寫作範式。但隨着唐宋古文運動的發展，記體文議論色彩逐漸增加，宋代書齋記文數量遠超唐代，漸成風氣，形成寫作範式，依照齋室名號以發議論。這種議論往往還帶着道德論述，為一個物理空間賦予道德意義，而不只是對一個空間命名緣由的紀錄。例如歐陽修的〈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鑑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於諂，非非近於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

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記於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向，植叢竹，辟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⁵

文章先不交代背景，而是直接議論，從秤、水的比喻到人，說「靜」的重要。表面上看開首突兀，前無鋪墊，議論的目的何在

並未點明。實則為何要「靜」？因要明是非，心靜才能智識明，才能斷是非。然後再進一步，在「是是」與「非非」間，歐陽修認為「是是近於諂」，「未若非非之為正」，暗暗點題，說明「非非」的重要。第二段才具體描述建造非非堂這一空間的緣由及其面貌，然後再呼應首段所議論的「靜」，道出命名非非堂的內在原因。文章從「靜」開首，末段也仍提到的靜，一切佈置、植物、光線，都被賦予了靜的意涵，也反過來營造了這個空間的靜。如此強調，其實大可以「靜」命名，但之所以強調「靜」，是為了能夠「非非」，求靜並非終極目的。這個空間並不是為安逸享樂，圖清靜，而是別有道德意涵的。「靜」只是客觀環境的描述，本身並沒有道德判斷，「非非」則是這個空間道德力量的彰顯。換句話說，歐陽修營構了一個道德空間，在這個空間裏讀書生活，就是一種靜的修煉，這個空間本身就是在提醒齋主要有「非非」的道德力量。

這種圍繞書齋的名字來做文章、發議論，特別是上升到道德層面來論述的寫法，是唐宋古文運動的底色。所謂文以載道，也是書齋記文的典範，對後來的書齋記文影響很大。直到晚明，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對傳統古文法度、儒家思想相當反叛的時代，書齋記文的寫作產生了新變。晚明的書齋不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道德空間，而是一個強調享樂的山林空間。

※ 三、另類山林：晚明公安派的書齋記文

明清時期是文學理論高度發展的時期，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文學流派。武斷一點說就是兩股思潮，復古與性靈，當然二者不完全矛盾，也有相互雜糅之處。而晚明公安派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正是對傳統法度、思想的反叛。唐宋古文的文以載道，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強調文學的道德教化作用，並且上升到一種必然性，文必要載道。如將這個邏輯推到極端，則以古文來作一種純粹審美的、愉悅的個人表達，可以說是不道德的。然而晚明的性靈思潮恰和這種文章風氣不同，表現在書齋記文寫作上，所表達的道德抱負相對較少，更顯而易見的是將書齋作為文人自娛的空間。

和歐陽修〈非非堂記〉將書齋論述成一個道德空間不同，晚明的書齋記文更強調書齋生活的娛樂性質，讀書也成了一種以自娛為目的的行為，而沒有傳統致仕為官，乃至齊家治國的道德感。明人何良俊所感嘆「吾有清森閣在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彝鼎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乎！」將收藏書畫名帖，金石古董的書齋與「僕僕牛馬走」的生活對舉，強調的不是書齋作為讀聖賢書以踏入仕途，乃至介入道德領域的功能，而是隔絕外界，精神世界得以自足的個人空間。這種將書齋空間個人化，乃至娛樂化的特點，晚明公安派的書齋記文最為突出。比如袁中道記袁宏道的硯北樓。文章同樣以書齋名展開，說明硯北

的意思，但通篇以對話來寫，讓袁宏道現身說法，是少見的寫法。更重要的是，袁宏道這裏的讀書寫作和傳統儒家所謂的讀書完全不同：

然而寂處一室，又未能即效寒灰古木之事，勢不能無所寄，以悅此生。柳下之鍛，叔夜所以寄也，吾不堪勞；曲蘖之逃，元亮所以寄也，吾無其量；《白鶴》、《何常》之調，戴仲嶽所以寄也，吾不解操。若夫貯粉黛，教歌舞，以耗壯心而遣餘年，往時猶有此習，今殊厭之。昔裴公美一生醉心祖道，而晚年托鉢歌伎之院，自云可以說法度人。白樂天亦解乘理，至頭白齒豁，時攜羣粉狐往牛奇章宅中鬥歌。此有何好，而自云天上人間，無如此樂？雖云遊雲幻霞，無所污染，然道人自有本色行徑。湯能沃雪，雪能湯凝；火能銷冰，冰強火滅。出水垂蓮花之質，切泥損太阿之鋒。以此為奇，是以漏脯止飢，白雪已濁也，吾必不為。然則吾之所寄，惟此數千卷書耳。陶弘景謂人生解識，不能周於天壤，區區惟恣五欲，實可愧恥，掛冠神武，遂居積金澗之松風閣，孜孜批閱，此吾師也。往周旋龍湖老子，見其老不廢書，人或規之。老子曰：『他日青蓮池上，諸大士娓娓豎義，我以固陋，張口雲霧，此幾許苦痛事。』人以為謔，吾實心佩其言。今而後將聚萬卷於此樓，作老蠹魚遊戲題跋，興之所到，時復揮灑數語，以疏論性靈，而悅此硯北之身。吾志畢矣，吾計定矣，此余命名意也，弟其為我記之。⁶

他視讀書為「人生閒適之趣」，文中和讀書並置而論的是喝酒、鍛劍、旅遊、隱居、彈琴、歌舞甚至青樓歌妓。雖然他選擇的是讀書，但主要的理由是有的他不懂，有的已非所好，故還是讀書最好，並沒有將讀書寫作放在絕對的高位，絕不是儒家三不朽那般神聖。後文他提到視為「吾師」的陶弘景，以及所崇拜的李贄，一是道教人物，一是被批評為異端邪說的人物，以他們作為自己讀書仿效的對像，也絕不是儒家傳統的追求。文中雖沒有說他所要讀要寫的是什麼書，然而根據他曾給龔惟長的信可以知道，絕不是儒家經典，語云：

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⁷

可以想見，袁宏道的硯北樓完全是他個人的娛樂空間，他要借這個空間「以悅此生」，強調愉悅，而非「以修此身」。並且有了硯北樓袁宏道並非真的「吾志畢矣，吾計定矣」，心滿意足了，他後來又在硯北樓前修葺捲雪樓，又請袁中道作記：

中郎卜居沙市，既治一樓曰硯北以瞰江，其前尚有隙地。一日梯而自登其脊以望，大笑曰：「吾事濟矣。」遂於樓之前復植兩楹，承霽而出之，如頭上髻，始盡得江勢。舉江自蜀趣吳，奔騰頽疊，澄鮮朗耀，震蕩大地，淹潤河山者，悉歸

几席之下。凡巴西之遠峰，夢南之芳草，九十九洲，乍隱乍現。千帆競舉，驚沙坐飛；棹歌漁唱，接響互答；霽雨旦暮，煙景萬狀。於是中郎登而樂之，而謂予曰：「宗少文棄衡山而止江陵也，有以也哉！」時暑路方升，九市如炙，而登此樓，則大江如積雪晃耀，冷人心脾。故不待其成，日夕游焉，而字之曰「捲雪」。⁸

江景壯麗非常，「奔騰頽疊，澄鮮朗耀，震蕩大地」，「千帆競舉，驚沙坐飛」。這樣的景象透露一種熱鬧的氛圍，這種山林意趣恐怕也是傳統書齋記中少見的。

硯北樓讀書，捲雪樓觀景，袁宏道的書齋最突出的特點其實正是享樂，兩文分別強調了讀書的閒適和山水的靈趣，以此來寄託餘生。這裏面並沒有什麼道德的抱負，完全是自我個人的寄託。當然這兩篇寫的是袁宏道辭官歸鄉，自然沒有讀書求取功名的動機，也更不會有歐陽修非非堂那樣浩然正氣的道德追求，但是袁中道的諸多書室樓臺記文，時常以歸隱和入仕相對，也毫無例外的全站在山林的立場，即便提到讀書也不會和功名、道德放在一起討論，歸隱山林幾乎是袁中道畢生願望。然而這種歸隱，以及其所想像的山林，和此前或多或少帶有儒家思想色彩，或以修身，或因不得其時而歸隱以待的山林大不一樣。書齋記文在晚明的這種新變可以說叛離了儒家思想的傳統，這種文風在清初自然受到嚴厲的批判。

※ 四、重建道德：清初姜宸英的書齋記

《四庫提要》對公安派的批評頗具代表，直言「破律而壞度」。「律」、「度」看起來是文章的形式文法，其實背後正是一種道德判斷，清初邵長蘅便批評這種文章不過是「清客陪堂」，「廣座中忽發一趣語，亦足令貴客解頤，然人品掃地矣。」⁹ 這種批評幾乎貫穿清代，在古文領域裏便有了重振唐宋傳統的呼聲，這不獨是一種文學上的復古，背後更是一種道德的重建。文章開首所引的姜宸英正是此中要員。然而有趣的是，清初是一個特別的歷史時期，在經歷了晚明的奢靡繁華後，清初文人對道德重建的呼聲愈大，其內在對山林享樂的懷想就愈曖昧。道德和山林雖然並不矛盾，但畢竟和仕與隱的選擇相關聯，二者不乏緊張關係，前文所引〈停舟書屋記〉正是顯例。不獨此文，姜宸英為友人葉奕苞所作〈小有堂記〉更要為其退居山林作一番解釋，好平衡道德與山林的關係。文章先描繪了小有堂所在的半繭園，葉氏如何親力親為打造園林，慨嘆此園「至君四世矣，其同時之廢為榛莽，或易名他氏者多矣，而是園者至今無壞益新，則以君之能無忘先人之業以然也」¹⁰，然後便為葉退居山林解釋道：

或謂君以彼其才，宜早自表暴，取世光寵，顧退而自安於邱壑，誠非所宜。余謂今之汲汲自勵為當世資者，非必其天性，皆汨沒於富貴利欲者也。蓋亦有求為買山而隱而不得者，而

隱忍以就之。蘇秦曰：「使吾有田二頃，安得佩六國相印乎？」
由今觀之，六國相印之與二頃田所得孰多？況又有求而未必
得者耶？葉君之賢，其知之審矣。且古之君子，雖其功成名
立，巍然係天下之望，猶常以區區者與夫山人逸士爭其所嗜
好於一泉石之間。此其寄託者甚深，未可以常情測也。

葉繼承其父繭園的東半側為半繭園，經營用心，嘉卉林立，清泉
繞除，景緻極佳。因此文章設問，以葉君之才而自安於丘壑，恐
非所宜。實際上這恐怕也是葉氏的焦慮，其〈半繭園十叟圖詩序〉
記載：

先大夫名園曰繭，苞請其說，則曰：「繭，蠶衣也。蠶之功，
衣被天下，非作苦休息於繭中，無以盡其用。予耄矣，小子
正抽絲營繭時哉。」苞受命而退。

他的父親將園林命名為繭，並非要讓子孫在繭中休養生息，而是
要如蠶一樣吐絲成衣，衣披天下。如今葉退居園中，正和父親的
囑託相違背。不過葉之退隱另有隱情，據傳他曾參加康熙博學鴻
儒科，然為忌者所匿，故憤而隱居不仕。姜宸英或知此情節，而
引蘇秦典故謂古之君子，即便功成名就，心中所求不過山林間一
泉一石而已，彷彿功名並不重要，山林方是歸宿。但這種辯解顯
然是套話，古之君子所求雖只是一泉一石，但畢竟功成名立。小
有堂所處的這一片佳山水，表面看來自是一片山林景緻，背後也

寄託着葉氏未能入仕的遺憾。

葉奕苞的退居山林得到理解和辯護，然而姜宸英的另一友人王昶的運氣就沒那麼好了，姜為他所作的〈敦好齋記〉，便真是繼承唐宋古風，展現出一種道德的力量，給王昶的歸隱施加不少壓力。「敦好」出自陶淵明「詩書敦宿好」，這位著名的田園詩人，隱逸典範，在姜的文章中成了一位學道者，姜就着「敦好」之義展開議論：

夫自漢以來，詩書之放廢久矣。至魏之末季王何輩出，競為清談以惑世。士大夫非《易》、《老》、《莊》之書不讀。《易》，聖人所以明陰陽消息之理而與異端之旨同述，其傳流於江左，糟粕六經，菲薄湯武，百餘年不絕，而後熾為乾竺之教。至於江陵失守，蕭繹輟講，文武之道竟與瓦礫同殉，此晉名流之遭禍所以不在秦李斯下也。陶公傷之，其言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其悲時憤俗而自寓之意見矣。南朝二百八十餘年無人能為此言者，惜也。遭時不幸，終以酒人自晦，非其志也。使其得時以試行其所學，佛老之害或者其猶未甚歟？

今王子德修學殖，適於世用，其視陶公之所好，當不僅託諸間居也已。然而今天下風俗之患，與前又異。人懷狙詐，貪

利鮮耻；名節不立，忠信不植；朝野相被，習為固然。此其較清談之害孰多？吾滋懼先王仁義禮智之教不盡委諸地不止。傳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夫物流極則必反，由今之道反之，必自經術始。吾友能無意乎？吾與子之稱是齋者，宜在此不在彼也。¹¹

姜宸英從漢說到六朝清談之害，儒學衰微，並引〈飲酒詩〉，說陶是「遭時不幸，終以酒人自晦，非其志也。」然後稱讚王暉是「德修學殖，適於世用」，用陶淵明的詩句來命名書齋，應不只是「託諸閒居」而已。繼而慨嘆天下人心不古，道德大衰，朝野如是，「先王仁義禮智之教不盡委諸地不止」。因而以反經求道，重建道德來勉勵他，認為以「敦好」名齋真正的用意正是在道德，不是在山林。這個書齋便被他加冕了一層濃厚的道學意味。有趣的是，姜宸英愈是強調這種道德重建的寄託，卻也愈顯得齋主並非這樣理解陶淵明，更不是以這樣的抱負來命名書齋。王暉正是一個頗有魏晉風度的人物，以陶詩名齋，正是仰慕其歸隱的高風。「詩書敦宿好」的下一句就是「林園無世情」，這裏的詩書顯然是林園的一部分，是歸隱語境中「樂琴書以消憂」的詩書，而非儒道興衰意義上的典籍。姜宸英強調陶淵明學道，若非不得時，不會歸隱，也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陶淵明。他似是要以陶淵明道學的一面來刺激王暉。但王暉恰恰在功名上並不進取，很早就放棄舉業，他最出名的著作可能就是學《世說新語》編著的《今世說》，搜羅當朝著名文人的言談行止。姜宸英明知齋主趣味，卻

要反着說，讓敦好齋這一山林空間也充滿了道德力量，對比晚明公安書齋記文中那種以讀書為娛樂的空間，文章背後的精神世界全然不同。

※ 五、結語

書齋記在傳統古文文類中只是記體文的一種，算不上重要的門類，並未受到古人專門的關注。相比起遊記，如張岱所謂「太上酈道元，柳子厚，近世袁中郎」，形成一個脈絡，本文所謂書齋記文的寫作傳統只是後設的概念。然而從宋代書齋記文中那種充盈的道德氣息，書齋作為道德空間，到晚明突出書齋自娛的功能，成為一個超出傳統山林想像，既和世俗保持距離，又不全然歸隱的娛樂空間，再到清初，回到唐宋傳統，卻又在道德和山林之間表現出一種曖昧態度，成為文人表述心跡的心靈空間，可見這一文類也自有傳統，既可窺探古典散文的發展演變，也可體察文人心態，值得關注。清初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不論時人如何批判晚明，晚明的影響依然很大。以姜宸英為例，其書齋記中對山林與道德、仕與隱的微妙態度，耐人尋味。由此而上溯傳統，對比晚明，或也可以成為窺探文人心靈史的一個角度。書齋記書寫空間，為物理空間賦予精神意義，梳理這類文獻，再結合明清繪畫、書齋古蹟，或許更可窺見具象且立體的明清文人的內心世界。

注釋

- 1 〔清〕姜宸英：〈停舟書屋記〉，杜桂萍主編：《姜宸英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頁514。
- 2 同上注。
- 3 同上注。
- 4 同上注。
- 5 〔宋〕歐陽修：〈非非堂記〉，《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1667。
- 6 〔明〕袁中道：〈硯北樓記〉，《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623。
- 7 〔明〕袁宏道：〈與龔惟長先生〉，載《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206。
- 8 〔明〕袁中道：〈捲雪樓記〉，《珂雪齋集》，頁624。
- 9 〔清〕邵長蘅：〈與金生其三〉，載《邵子湘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7-248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頁787。
- 10 〔清〕姜宸英：〈小有堂記〉，《姜宸英集》，頁511。
- 11 〔清〕姜宸英：〈敦好齋記〉，《姜宸英集》，頁668。